



青未了



当下小文谈>>

“和”贯穿中国文化

□叶小文

中国文化向来重“和”，“礼之用，和为贵，先王之道斯为美。”因此史上各教各派，大都求同存异和睦相处，甚至取长补短互通互融。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：“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，现代世界极为需要。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。”

民间传说有“虎溪三笑”的典故。虎溪在江西庐山东林寺前，相传东晋高僧慧远驻锡东林寺时，来访和参拜者络绎不绝，常常宾朋满座，谈笑风生。但慧远送客，一向不过虎溪。一天，诗人陶渊明（也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）携道士陆修静来访。儒释道三位高人相谈甚欢，临别依依不舍。

慧远送客，仍一路谈笑风生，竟不觉得惯例走过虎溪，溪旁有虎见状都惊奇地欢叫起来，三人大笑而别。后人于此建“三笑亭”。其实，慧远与陆修静并非同一时代人，交游之说难免牵强。但南北朝以来，儒释道交流交融渐趋流行，“虎溪三笑”便传为美谈。

日前，受万众齐心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所感召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法师（正好也是东林寺现任住持），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道长，以及儒学家、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，三位堪称当代儒释道的大师相聚一堂，“拜水都江堰，问道青城山”。我应邀前往为他们主持论坛，躬逢其盛。三老相谈甚欢，传说中“虎溪三笑”的愿景，似乎真的出现了。

所谈围绕一个“和”字。任道长说，道的属性是“和”。天地日月森罗万象、芸芸众生千差万别，无不蕴含着两重性，“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冲气以为和”。当利益冲突、矛盾纠纷时，不妨彼此体谅、委曲求全，就能开阔胸襟，以德报怨，所谓“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”。传印法师说，佛教讲“理事圆融，事事无碍”，即是教人克服贪嗔痴的欲念，达到和谐的境界。身和同住、口和无争、意和同悦、戒和同修、见和同解、利和同均。杜维明教授说，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、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”，对“和”与“同”的不同态度，竟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。以“和而不同”为主线，儒学追求的“和”，是以“和”对“多”集散成大，是以“和”制“合”平衡

互补，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。“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

看来儒释道三家的确以一个“和”字相通。因为，“和”的哲学就是“会通”，既有包容，更有择优；既有融合，更有贯通；既有继承，更有创新，是一以贯之、食而化之、从善如流、美而趋之。“和”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，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。“和”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，因而能够与时俱进、与时俱进。

“虎溪三笑”又现，一个“和”字会通。从中国传统文化，包括儒释道的学说中，挖掘和发扬“和”的丰富思想，与我们今天大力培育奋发进取、理性平和、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氛围，也可以“会通”。

心灵的依托，不能靠外来文化

——本报记者专访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，对话文化与传统



国学渐热，传统愈显。当下我们为什么要弘扬传统，当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学习国学。当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发生变化时，我们需要复兴什么样的文化，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否已经做好了复兴的准备？宏大的文化对我们个人，有哪些切实的影响？近日，本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先生。对这些问题，陈来先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。

图为9月底，陈来（左一）在尼山论坛



文/片 本报记者 韩适南

齐鲁晚报：在许多人看来，文化研究只是书斋里的打闹，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情调，和民众的距离太远，这些研究能帮我们解决住房问题与交通拥堵吗，能帮我们更好地解释中美关系吗，能让生活压力巨大的我们找到一丝精神慰藉吗？

陈来：文化是不能要求直接的功利性，所有文化都一样。贝多芬的音乐能解决住房问题吗？《荷马史诗》能解决就业问题吗？唐诗宋词了解得再多，就能帮人们面试了吗？不能。

但人生的需求是非常丰富的，是多层次的。例如信宗教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当然不能，但能改变你认识问题的态度。为什么宗教能一直存在，就因为它一定有能满足人生命中的一些需要。

不能说文化没有实际作用，只是我们对什么是实际要有一个全面了解，不能这么直接。黑格尔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，既然这么出现了，就有一定的价值。

许多四十岁以上的人，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相当的成就建树，也来参加一些国学班和文化班，就是因为随着人生的成长，他们对文化的精神的需求越来越丰富。

齐鲁晚报：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弘扬传统文化？直接借鉴西方等国家的优秀文化不可以吗？这个问题从清末以来就已被反复讨论，您的态度是什么？

陈来：这百年来，对待文化的观点也是有些起伏变化，不能说这百年来都是全盘西化。

五四时期，在思想界、文学界兴起了新文化运动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新文学运动。后来发展到全盘西化，但时间不长，十年多一点的样子。

五四时期正如《新青年》一样，代表青年的文化。青年的文化在当时成了主导文化。老一点的人说不上话，全是二十几岁的人。但随着年轻人的成长，他们自己就会变。结了婚，生了孩子和一个大学生说话根本是不一样的。

接着就是“九一八”了，这时“五四”在主流文化里基本被甩掉了。这时不是民主，不是自由，而是团结。团结主要是依靠内的传统。抗战中来动员大家的资源是什么？是传统文化，此时，传统文化就发挥了这样巨大的作用。

每种文化都有优秀的东西。弘扬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文化并不冲突，也不矛盾。比如我们对印度文明的吸收就是例子，没有人要拒绝西方文明，主要是怎么摆它。

弘扬传统文化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学习西方文化来帮助我们，但有的东西是很难替代的。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，这种不是外面的东西可以代替的。

精神家园的建设，心灵的依托，也不是靠外来的文化就能解决的。我们更喜欢跟自己的文化亲近，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，稳定

自己的心灵。

齐鲁晚报：从世界格局来说，中国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我们讲中华复兴，有一条是文化的复兴，那么我们应该复兴哪些文化？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，我们在文化上有没有做好迎接复兴的准备？

陈来：对我们来说，确实要复兴中华文化，一段时间以来，中国人是在挫败的、自卑的状态之中。总体来讲，文化复兴是讲三十年来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，一些世界观、价值观，以及认识世界的态度，对世界的审美的观念。

传统文化复兴，不是传统文化一家独大，是和现在已有的文化、自己创造的文化、其他优秀的文化一起复兴。

不能说我们做好了文化复兴的准备。这个口号提了十几年，现在有一些准备，不能说做好了，因为对文化的复兴，还是认识上有差异，有人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想法，许多做和传统文化有关的人，还有这样的想法。有人认为，古代文化只有放在博物馆的作用，是死文化，和现代社会没有联接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没有做好。

当然有许多人在积极提倡。我觉得民间的反应不错，没有许多限制，没有各种条条框框。

齐鲁晚报：温家宝总理最近在联大推介中国，现在的西方对于中国的认识到了什么程度？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呢？许多人一直强调中国真正的复兴，是价值观

的输出，而不是廉价商品的输出，如果我们要输出价值观，该输出什么样的价值观？是改造后的儒家吗？

陈来：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，大大超过西方对中国的了解，这个是差距非常大。从国际的关系来讲，我们发生了许多冲突，一个方面就是外界对中国不了解，对中国当代的政治不了解，对中国的文化不了解。因为中国当代许多东西是从古代来的。

现在没有文化输出的提法，我们主要做的还是让西方了解我们。十年前我们是韬光养晦，现在我们虽然有孔子学院，但主要是以教授语言为主，没有有意识地宣传中国文化，主要是让别人了解我们。

就目前来讲，许多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偏见。有人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十八九世纪。

我一个在美国的朋友告诉我，他的一个学生生长在美国，因为这个学生经常往来上海北京，所以对中国有很好的了解，但这个学生的历史老师，还是把中国人讲成十八九世纪的样子。学生告诉历史老师他讲得不对，但老师不能接受。现在中国人是很急切的了解外面，而美国等一些国家有偏见，认为老子天下第一，不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。

齐鲁晚报：国学逐渐成为显学，但是许多人对国学的学习，还是以“旧典章”为主。在当下，我们如何学习国学，弘扬传统文化，让国学对我们产生实质有益的影响？

陈来：典章是和制度联系在一起，典章制度和价值是没有直接关系的。现在大家读得比较多的还是经典，就是经书。

不光是儒家。法家、兵家大家都在读，现在读孙子的人可能比读四书五经的还多。杂家、法家，还有黄老法家也有好多人读，读这些书的人，大部分都和现在的管理有关联。

也有一部分是从文化教育出发，基本上是强调儒家文化经典，主要是四书。这个是不变的。现在有好多读经运动，读经班，广义上讲，经典的还包括一些文学的作品，整体来看，文化方面、教育思想方面、典章制度的学习比较少。

陈来简历

陈来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著名哲学史家。师从张岱年先生、冯友兰先生。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，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、宋元明清理学、现代儒家哲学，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领先水平。

身边的传统>> 赊卖鸡苗说诚信

□梁开文

记得小时候，我们农村每户都会养上几只老母鸡，这些老母鸡一下一个蛋就会给家里省下买鸡蛋的费用，而省下的钱男人可以买包烟，女人可以买棵菜，孩子可以交学费。每当村口响起“小鸡苗，卖小鸡”的叫卖声时，乡亲们总会围上去凑热闹。卖鸡苗的大伯推着自行车，后面笼子里的小鸡“叽叽喳喳”叫个不停仿佛在努力地推销自己。

遇到买鸡苗的乡亲，大伯便把鸡笼卸下来，经过一连串貌似专业的鉴定，我媽和众邻居都挑好了鸡苗，但是并不付钱。卖鸡苗的大伯只是将交易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，然后骑着自行车离开。

小鸡苗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长大，三两个月之后，卖鸡苗的大伯重新回到我们村，不过这次他没带鸡苗，只带着那个笔记本。笔记本上或许写着“郑庄，小文，10只，东头，家后有一池塘”。意思便是“郑庄村梁开文家买了10只鸡苗，家在村东头，屋子后面有一个池塘做记号。”

大伯走到我家门外大声喊：“家里有人吗？收账的来了。”

“有人”，大多数时候，我会和我媽一起出来，“收鸡苗账的是吧？”

“是啊，你家鸡苗成了几只母鸡？”

“买了10只，最后成了6只母鸡。”

“哦，三六一十八，你给我十八块钱就行了。”

“嗯，给你钱。”

不到二十元的生意，历经几个月后以如此简单的形式终于完成，当我写这些东西时，自己也不相信是否真的存在过这种交易方式。后来问起我媽，她说：以前赊卖鸡苗的很多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邻居间都不轻易往外借东西了，谁还敢把鸡苗卖给陌生人啊。

之所以买10只鸡却只付6只母鸡的钱，是因为乡亲只想养母鸡用来攒鸡蛋，不想养公鸡打鸣或吃肉，因为在农村比公鸡起得早的人很多，而鸡肉在我小时候比鸡蛋奢侈百倍根本吃不起。卖鸡苗的大伯没有火眼金睛，他也看不出哪只小鸡会长成大母鸡，不可能给买主提供所需要的母鸡苗，于是账就这么算了。而即便鸡苗夭折，大伯也一般不予以追究。

这种交易的关键是建立在彼此绝对信任的基础上，而在充满怀疑的今天，你可能和我一样，都没想到这种交易曾经存在过。此文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一点彼此信任，这样才有利于将以前人心的淳朴和现在经济的繁荣结合起来，实现全面发展，促进社会和谐。